



## 虞山的灵魂(上)

◎ 周 游

—

贤哉虞仲氏，让国来荆蛮。  
断发文其身，之死不复还。  
孤冢郁崖峨，屹立山之间。  
高风播宇宙，邈矣谁能攀。  
青山得以名，万古永不刊。  
——周彦翼《虞仲墓》

真是“江山也要伟人扶”(袁枚《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》)!

常熟虞山，古称乌目山，又名海隅山，俗称卧牛山，因商周之际江南先祖虞仲卒葬于此而得名。虞山海拔仅有二百六十多米，位于城西北处，南有尚湖，绿荫覆盖，寺台亭墓星散其间，逶迤延伸入城，宛如一颗美丽的翡翠。



虞山国家森林公园 吕林业局供稿

传说,常熟本无山丘。殷朝末年,姜尚在朝为官,因为上书谏诤得罪纣王而遭通缉,慌忙南逃,一直逃到江边,前面滔滔大江挡住去路,后面追兵紧紧赶来。正在绝望之际,江边出现一头乌目神牛,姜尚跨上牛背,神牛让姜尚闭上双眼后奋力向江中游去。这时,纣王已追赶到,看见神牛救走姜尚,就挥剑刺伤了神牛。神牛拼尽全力游到东海之滨。乌目神牛因流血过多,慢慢卧伏下来。可姜尚仍闭目坐在牛背上,待他睁眼

一看,神牛已化成了一座山,其伤口便化作气势雄伟的剑门。远眺虞山,酷似一头卧牛,头朝东南,尾向西北,半山处的辛峰亭犹若牛角。老牛为何伏地不走?只因常熟土地肥沃、水草丰茂之故。

走近虞山,率先闯入眼帘的是清权坊,正面刻有“敕建先贤仲雍墓门”,旁边有清权祠。稍后即第二道石牌坊,正面有曹秀先题写的“南国友恭”,背面是胡文伯题写的“让国同心”,两侧镌有楹联,上联是“道中



泰伯像

清权垂百世”，下联为“行侔夷惠表千秋”。第三道坊在山腰间，题额是“先贤仲雍墓”，背后刻有“至德齐光”，两侧楹联为程光炬题撰，上联是“一时逊国难为弟”，下联为“千载名山还属虞”。其后便是虞仲墓穴，背山而建，居高临下，四周巨石嵯峨，松柏林立。

踏着岁月留下的隐约青苔和时光投下的斑驳阴影，我们敛色循坡走进了历史深处。

商朝末年，我国西部有个周族，大王名叫古公亶父（即周太王）。他有三个儿子：长子泰伯（又称太伯），次子虞仲（又称仲雍）以及三子季历。其中，季历有个儿子名为姬昌（即周文王），聪明且有圣德。古公特别喜欢这个孙子。姬昌这个名字就是古公给起的，他把周族的繁荣昌盛寄希望于姬昌。按照惯例，王位应由长子长孙继承，长子长孙不在，方由次子接班。古公想让季历继位，再由季历传给姬昌，但是又怕这样容易造成弟兄不和，族人不满意。古公为此犯难了。

其实，（泰）伯（虞）仲二人早就看出了父亲的心思。二人密谋，以去衡山采药为名离家出走。途中，伯仲二人获悉古公去世，故意不返回家，反而加快步伐，远离故乡，以避免被众臣拥立。古公发丧之时，伯仲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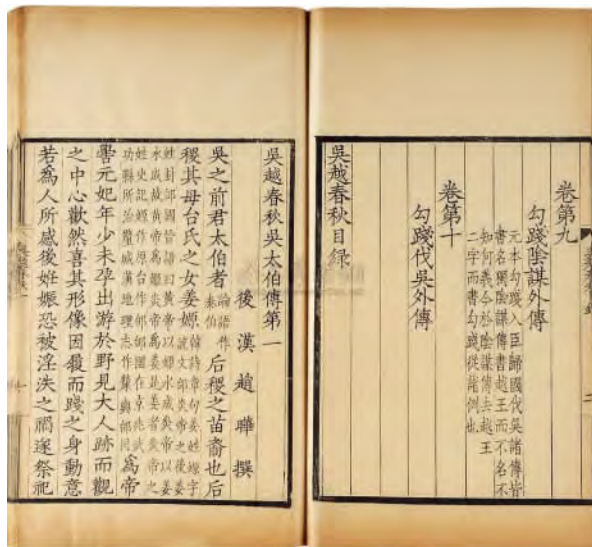
经千里迢迢来到当时还是荆蛮之地的太湖之滨，与当地入一样，断发纹身。

检阅《史记》，我们不能不抱怨太史公司马迁惜墨如金了：“太伯欲立季历以及昌，于是，泰伯虞仲二人乃奔荆蛮……”寥寥数语，浓缩了伯仲二人奔吴途中多少艰难险阻！从岐山到太湖，即使是走直径也要三四千里，何况当时人烟稀少，在崇山峻岭、丛林草莽间踩出一条路来，绝非易事。打个比方，假如没人追赶，为求生欲望驱使，也许会铤而走险，而为仁义道德计，似乎不必刻意历经艰险，只要在离故乡不远的地方找个生存之处，便可成全古公和季历乃至姬昌了。那么，伯仲二人为何不远千里奔吴呢？史无明载。不过，据《左传·哀公七年》记载：“泰伯端委，以治周礼；仲雍断发纹身，羸以为饰。”原来，泰伯来到吴地推行周礼，但是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。后来，虞仲作了很大的变易，不仅“断发纹身”，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字——孰哉（吴语可理解为“熟了”）。可见，伯仲二人曾经投奔其它地方，但是都被驱逐出境。奔吴之后，由于虞仲入乡随俗，完全和当地人打成一片，方有立足之地。不然，伯仲二人很有可能还要继续流浪。

历史的真相总被掩埋在地下。上述故事出自导游美眉之口，自然有些水分。据《古今乐录》记载：“泰伯既与虞仲逃去，披发纹身，为王采药，后问太王卒，还奔丧哭于门。季历谓泰伯：‘长子也，当立。’垂涕而留之，终不肯止。季历作哀慕之歌。”无锡《金匱县志》（卷三十三）载有《哀慕歌》，歌曰：

追念伯仲，我季如何，梧桐萋萋，生于道周。  
支骨离别，垂思南隅，瞻望荆越，涕泪交流。

站在“南方友恭”坊前，我们更加怀念当时接纳伯



汉赵晔《吴越春秋》书影

仲二人的先民,他们犹如这座青山有着博大的胸怀……

奔吴之后,伯仲二人与当地人“并耕而食,饘飧而治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),还为荆蛮之地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华夏文化。久而久之,伯仲二人受到了当地人的拥戴。泰伯被推举为首领,泰伯“自号勾吴”。泰伯身后无子,虞仲又被推为首领。后来,周武王统一天下,才把伯仲二人这一支宗族清理出来,封



为吴国。一个人道德修养,真要做到伯仲二人这样“弃天下如敝屣,薄帝王将相而不为”,到了这地步,那自然会真正“君子坦荡荡”。帝王将相不以权位为荣耀,视为一个重任压到自己身上来,自然而然不能不尽心力。但是,杨广另有一种狂妄的说法:“我本无心求富贵,谁知富贵迫人来。”得知自己快要丢失江山的时候,杨广竟然对着镜子,拍拍自己的后脑感叹:“好头颅,谁能砍之?”后来果然被叛军杀掉了。检阅中国历史,我们发觉能不被富贵所迷惑帝王之后如伯仲二人是不多见的。

灭商之后,周武王姬发寻求泰伯、仲雍的后代。当时仲雍的曾孙周章已在勾吴继位。周武王立吴国,加封他为子爵,列为诸侯。周章陵墓亦在虞山东岭,仲雍墓南侧,墓碑刻有“古吴王周章陵墓”字样。周章是吴国的第一代国君,《春秋》《左传》称他为吴子。周章墓现有墓堆、罗城、拜台、墓门、墓道等。

清代苏州文人顾禄曾经指出:“吾吴古称荆蛮,自泰伯、虞仲以来,变其旧俗,为声名文物之邦。陆士衡所云‘土风清且嘉’者,迄于今,文采风流为天下冠。”(《清嘉录·宛山老人序》)站在虞仲墓前,我们回眸常熟繁华的市容,遥想当年的蛮荒之地,油然而生今非昔比之叹。

据龚明之《中吴纪闻》记载:“常熟虞山,有石室十所,昔太公避纣居之……”这里,我还听到一个传说:西周开国元勋姜尚曾经隐居在乌目山,垂钓于山下湖畔,不设鱼饵,放言:“不钓鱼鳖,只钓王侯。”(黄道周《广

名将传》)时值殷纣暴虐无道,虞仲闻讯,不顾自己年迈,亲自考察姜尚,发现他有经天纬地之才,当即请他出山辅助姬昌推翻商朝,广施仁政……

智者乐水。姜尚去了,他在乌目山下留下了尚湖。仁者乐山。虞仲没走,他在乌目山上找到了归宿。从此,清澈的尚湖永远反映着虞山的崇高!

## 二

北山夫子尚遗阡,南国文章叹倒澜。  
栖鹤丽龟留射圃,眠龙变石护桐棺。  
千秋风气开吴会,六艺渊源祖杏坛。  
一瓣心香除礼谒,瑶墀独立久盘桓。

——闻一多《自言子文学书院射圃谒言子墓》

虞山东麓还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古墓,气势和虞仲墓一样雄伟,墓主是大儒言偃。

我们沿着墓道拾级而上,满心虔诚地瞻仰牌坊和石亭,感受着二千五百多年前言偃的博大与仁爱……

言偃墓道由三座牌坊和三个石亭组成。第一座牌坊面临北门大街,上书“言子墓道”四个大字。入内有“影娥池”,上架石拱桥——文学桥。过桥不远便是第二道石牌坊,横额刻有乾隆皇帝御书的“道启东南”,背面镌刻“灵萃勾吴”。再上有三座石亭,中间为半山亭,内有髹漆匾额,上有康熙御书“文开吴会”,左右两亭有乾隆年间的“御祭言子文”碑各一。再上百余步,在“龙头石”之上是第三道牌坊,横额刻有“南方夫子”,为雍

正时布政史鄂尔泰题书。言子墓就在坊后。墓圈石砌，内径约七十米，坟堆直径四米左右，高约二米。墓圈内壁有碑两块，一块为明崇祯年间所立的“先贤子游言公墓”碑，一块为清光绪年间所立的“先贤言子之墓”碑。言墓的附属建筑有罗城、祭台、飨堂等。墓道始建年月已无考。据文献记载，汉武帝时，言偃十七世孙言成大始修祖墓，后来经历多次修缮，现存建筑多为清代所建。

言偃，字子游，又称叔氏，常熟人，生于周敬王十四年（前506年），卒于贞定王二十六年（前443年）。他比孔子晚生四十五年。青年时代，言偃北上鲁国，学于孔子。据说，孔子三千弟子，七十二贤，他是其中之一；孔子得意门生十人，他是“十哲人中第九人”。因为“三千济济，七十彬彬，北学中国，南方一个”，故称“南方夫子”。

言偃到孔子处就学，主要学礼。礼是周朝一种道德规范和等级关系具体表现的一门学问，使用范围非常广泛，评论任何一件事情，总是以“礼也”和“非也”来划分。言偃对孔子竭力倡导的仁礼有特别的领悟，并且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气概和作风。可以说，言偃重视仁礼的精神本质，忽视其礼数小节。他曾批评子夏的门人：“当洒扫应对进退，则可矣，抑末也。本之则无，如之何！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意思是说，他们没有掌握仁礼的精神，只配打扫卫生、接待客人和应对进退一类的末节工作。他还批评子张：“为难能也，然而未仁。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意思是说，你注重礼乐形式难能可贵，但还算不上仁。《礼记·檀弓》非常生动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：“卫司寇惠忆之丧，子游为之麻衰。牡麻。文子辞曰：‘子辱与弥牟之弟游，又辱为服，敢辞。’子游

曰：‘礼也。’文子退，反哭。子游趋而就诸臣之位，文子又辞曰：‘子辱与弥牟之弟游，又辱为服，又辱临其丧，敢辞。’子游曰：‘固以请。’文子退，扶适子南面而立，曰：‘子辱与弥牟之弟游，又辱为服，又辱临其丧，虎也敢不复位。’”由此可见，言偃不仅是一个智者，且有狂者的胸次。

打开《论语》，我们发现言偃和孔子的对话较少，而且大都是讨论式的，就象苏格拉底所说的“精神助产术”那种论辩。郭沫若认为，《礼记·礼运》篇是“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”（《十批判书·儒家八派的批评》），是言偃或是他的弟子假托与孔子对话发挥关于“大同”、“小康”之说。

不过，言偃不像孔子那样热衷于“述而不作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，而是一个实干家，热心于政治实践。言偃当武城宰时以礼乐教化人民，孔子来检查时听到处处有弦歌，于是微笑着对言偃说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？”意为治理这小地方用不着以礼乐来教育，不必小题大作。言偃恭恭敬敬地回答：“我曾听老师说，上层人士学道，就会有仁爱之心，黎民百姓学道，就容易听从指挥。”孔子对于言偃的回答非常满意，便对随同他一起来的弟子说道：“言偃的话是正确的。我刚才那话是开玩笑的。”由此可见，言偃十分理解孔子的思想，而且身体力行。正因如此，孟子称赞言偃和子张子夏一样“有圣人之一体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。

朱熹曾经指出：“持身以灭明为法然，则无苟贱之羞；取人以子游为法，则无邪媚之感。”（《四书集注》）灭明复姓澹台，字子羽，武城人。相传，澹台灭明状貌甚丑，孔子曾以为他才薄。一次，孔子到武城问言偃：“你在这里得到什么人才没有？”言偃回答：“有个叫澹台灭明的人，走路不抄小道，没有公事不到我这里来。”言下之意，此人品行端正，不对上司溜须拍马，是一个可以重用的人才。同时，这又说明言偃很能识别人才，为官正派。孔子叹道：“吾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”（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）

言偃有句名言：“事君数，斯辱矣；朋友数，斯疏矣。”这话意思是说，要讲仁爱之“行”，也要懂得方法，不能乱干。对君王尽忠，也不容易。君王有了不对，每次见了劝他，次数多了，硬要做



孔门十哲言偃图

忠臣,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,有时会把命都丢掉。对朋友也是一样,朋友不对,你劝他劝多了以后,他不听你的,就会变成冤家了。言偃这话放在讲仁道这一篇的最后是含有深意的感慨。研究了言偃,才知作人真不容易,的确须要多体会历史、多体会人生,然后才能做到“造次必于是,颠沛必于是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,随时随地居于仁道之境。

孔子去世以后,言偃回到故乡常熟收徒讲学,其后学在战国时期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学派,但曾遭到了荀子的攻击:“偷儒惮事,无廉耻嗜饮食,必曰‘君子固不用力’,是子游氏之贱儒也。”(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)言偃的气概异于孔子,但他继承延续了孔子学说。不过,荀子后来又说:“世俗之沟犹督儒,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,遂受而传之,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,是则子思、孟轲之罪也。”(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)这话的意思是说,后世俗儒不但不知子思、孟轲的谬误,而且还以为他们的学说是仲尼、子游开创的,这真是子思、孟轲的罪过。因而,许多学者主张将“仲尼、子游为兹厚于后世”中的子游改为子弓是错误的,而今发现的郭店楚简《性自命出》有引言偃的言论。对此,康有为早就正确地指出:“着《礼运》者,子游。子思出于子游,非出于曾子。颜子之外,子游第一。”(《康南海先生口说·礼运》)

作为生命个体的言偃离开我们已经两千五百多年,但他生命的价值并未因此烟消云散。言偃的人生经验和政治智慧早已成为后人处事和从政的精神财富。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,它们又极大地丰富了古代中国的语言文化,它们已经汇入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大河之中,沾溉后人。因而言偃深受后人崇敬,累世不绝——

唐朝开元二十七年(739年),言偃被封为“吴侯”;

北宋大中祥符二年(1009年),言偃被封为“丹阳公”;

南宋咸淳三年(1266年),言偃被封为“吴公”;

元朝大德年间(1297-1307年),言偃被封为“吴国公”;

明朝嘉靖九年(1529年),言偃被封为“先贤言子”;

清朝康熙五十一年(1712年),朝廷批准在言偃后裔中设五经博士一员,世代承袭,用以奉祀先贤。

在言子墓道逗留了一会,我突然想振衣绝顶,于是沿着一级一级的石阶攀登,越往上走,似乎就越远离了喧闹的市声;越往上走,似乎就越接近了历史的深处;



言偃像

越往上走,脚下的山,便渐渐在心中有了一个新的高度。那是一种无法用尺丈量的心灵的高度。

### 三

此身原是赘,薇蕨首阳巅。  
昔醉湖桥月,今倾石屋泉。  
灵机开变轴,元气泄真詮。  
亦有王杨墓,牛羊草莽烟。

——杨无恙《西山寻黄大痴墓》

置身于风景如画的虞山,我们自然而然想起了元代山水画大家黄公望。

黄公望墓在虞山小石洞东侧,坐北朝南,冢后竖清嘉庆间裔孙黄泰所立“元高士黄公一峰之墓”碑一通,外设罗城、拜台,占地八百多平方米。墓道顺山坡而下,长约六十米,道口架单间冲天式一座,上镌“元高士黄大痴先生墓道”。越过墓前环山公路,有清代建脍堂三间,堂内曾经悬挂书法家季厚所书木刻楹联,上联是“公亦痴,我亦痴,过黄崖埋骨处,时情痴到颠狂野”,下联为“品愈高,才愈高,传尚湖钓雪图,画笔高出唐宋



明”。

黄公望(1296-1354年),字子久,号大痴、大痴道人,又号一峰道人。常熟人。据元人钟嗣成《录鬼簿》记载,黄公望本姓陆名坚,“乃陆神童之次弟也,系姑苏琴川子游巷居,髫龄时,螟蛉温州黄氏为嗣,因而姓焉。其父九旬时方立嗣,见子久,乃云:“黄公望子久矣”(《曹氏刊本》)。于是改姓黄,名公望,字子久。钟嗣成是黄公望的朋友,《录鬼簿》所记是可信的。据《清一统志·苏州府山川目》记载,琴川“乃常熟县地”,亦为常熟之别名。陈继儒《笔记》(卷二)亦有“黄公望,本常熟陆神童之弟,出继永嘉黄氏,故姓黄”之说。元人汤屋《图绘宝鉴》、明人王穉登《丹青志》也有类似记载。

黄公望出生时,正值南宋奸相贾似道专权,北方蒙古族日益强大。蒙古人先后灭了金、辽、西夏三国。1268年,元世祖忽必烈又以十万大军进攻南宋。南宋“国事如今谁倚仗?衣带一江而已”(宋文及翁《贺新郎·游西湖有感》)。襄樊被围数年,终被元军攻陷,长江已不能作天堑倚仗。元军很快推进到长江下游。黄公望六、七岁时,家乡就陷落了。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,掳走宋恭帝赵显及三宫后妃嫔从。此后,虽有文天祥、陆秀夫、张世杰等先后拥立恭帝之弟赵昰、赵昺,继续抗击元军,但已无力回天。1279年,南宋王朝

彻底覆灭。那年黄公望十一岁。

据《常熟县志》记载,黄公望少有大志,希望在政治上展身手,干一番大事业。但是元朝贵族统治者前期选拔官员并不采用科举制度,而是规定汉人做官必须从当吏开始,到了一定年限,视其办事能力如何,再决定可否做官。当吏也要有人引荐。黄公望直到中年才得到徐琰的赏识,在浙西廉访司当书吏,即《录鬼簿》(卷下)所说“先充浙西宪吏”,《无声诗史》(卷一)所说“浙西廉访使徐琰辟为掾”。后来,他又到大都(今北京),在御史台下属的察院当书吏,经理田粮杂务(参见王逢《梧溪集》卷四)。遗憾的是,他的上司张闾是个贪官。元仁宗曾派张闾“经理江南田粮”,张闾到江南后“贪刻用事,富民黠吏,并缘为奸”,搞得民不聊生,“盗贼”四起。延佑二年(1315年)九月张闾被逮捕下狱。黄公望不幸也受连累,被诬下狱,时年已四十七岁。其友杨仲弘有《次韵黄子久狱中见赠》:

世故无涯方扰扰,人生如梦竟昏昏。

何时再会吴江上,共泛扁舟醉瓦盆。

出狱之后,黄公望便绝了仕途之望,开始了隐士生活,并加入新道教,“改号一峰”,又“易姓名为苦行,号净墅,又号大痴”(《录鬼簿》卷下)。净墅,又作净竖、静竖。从易姓名、号大痴一事可以了解他此时失意的心



元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剩山图卷(局部)

境。他曾以卖卜为生,这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。当时大画家吴镇也在杭州卖卜为生。后来,黄公望画名大振,又以“新授弟子”为生。正如明人刘凤《续吴先贤赞》(《艺事纪录汇编》)所记:“为黄冠(道士),往来吴越间……教授弟子,无问所业,谈儒、墨、黄、老……”据陶宗仪《辍耕录》记载:“其徒弟沈生,狎近侧一女道姑。同门有欲白之于师,沈惧,引厨刀自割其势,几死。”沈生,即沈瑞,曾给杨维桢画过一幅《君山吹笛图》。杨维桢(号铁崖)《东维子文集》卷二八记有他跟黄公望学画的事。

看来,黄公望对徒弟的品德也有严格的要求。《辍耕录》还收有他为教授学生而写的《写山水诀》。首句便要求“学者当尽心焉”。最后警戒学生“作画大要去‘邪、甜、俗、赖’四个字”。文人卖画为生,盛于明清两代,在元代还不普遍。可见黄公望卖卜、授徒主要是为生计。

加入新道教后,黄公望行踪漂泊无定。王逢《奉简黄大痴尊师》诗云:“十年淞上筑仙关,猿鹤如重守大还。”(《梧溪集》卷一)他虽在淞江居住十年,但居所并不固定,更多的是外出云游。他还在苏州天德桥开设三教堂,有时寓居道院。他的《芝兰室图》就是在云间玄真道院寓居时画成的。他五十六岁左右尝游吴地华山,画了《天池图》。据高启《凫藻集》卷四《题〈天池图〉小引》云:“吴华山有天池石壁,……元泰定间,大痴黄先生游而爱之,为图四、三本,而池之名益着。”杨维桢在其《东维子文集》中多次提及黄公望,可知他六十岁前后及七十七岁时常和朋友一起乘舟游太湖,喜吹铁笛。《跋君山吹笛图》有云:“予往年与大痴道人扁舟东西柳间,或乘兴涉海,抵小金山,道人出所制小铁笛……”黄公望善吹铁笛,许多文献均有记载,《铁崖先生古乐府》卷二《五湖游》中有“道人卧舟吹铁笛”诗句。另据杨瑀《山居新语》记载:“黄子久,……阎子静、徐子方、赵松雪诸名公,莫不友爱之,一日与客游孤山,闻湖中笛声。子久曰:‘此铁笛声也。’少顷,子久亦以铁笛自吹下山。游湖者吹角上山,乃吾子行也。二公略不顾,笛声不辍,交臂而去。一时兴趣,又过于桓、伊也。”据李日华《六研斋笔记》记载:“陈郡丞尝谓余言,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箬中坐,意态忽忽,人莫测其所为。又居湖中通海处,看激流轰浪,风雨骤至,虽水怪悲诧,亦不顾。”《海虞画苑略》亦载:“(黄公望)尝



清王同愈《元高士黄公望》

于月夜棹孤舟,出西郭门,循山而行,山尽抵湖桥,以长绳系酒瓶于船尾,返舟行至齐女墓下,率绳取瓶,绳断,抚掌大笑,声振山谷,人望之以为神仙云。”或“隐居小山(位于虞山左近),每月夜,携瓶酒,坐湖桥,独饮清吟,酒罢,投瓶水中,桥殆满。”元至正五年(1345年),黄公望为倪瓚画的《六君子图》题诗,有“居然相对六君子,正直特立无偏颇”句,表明了他正直特立的性格。

黄公望也经常和倪瓚、王蒙、吴镇、曹知白等大画家相聚,切磋绘事,相互题赠,并和他们合作山水画,至今尚有他们合作的画迹存世。他和当时的名士杨维桢、张雨等也都是好朋友,杨、张常在他画上题诗题字。七十四岁那年,他题倪瓚《春林远岫小幅》有云:“至正二年十二月廿一日,叔明(王蒙字)持元镇(倪瓚字)《春林远岫》,并示此纸,索拙笔以毗之,老眼昏甚,手不应心,聊塞来意,并题一绝云:‘春林远岫云林画,意态萧然物外情。老眼堪怜似张籍,看花玄圃欠分明。’看来他七十多岁已“老眼昏花”,并不像明人所说“黄子久年九十余,碧瞳丹颊”(李日华《紫桃轩杂缀》),或如清人所说“年九十,貌如童颜”(《虞山画志》)。同年,自题《夏山图》:“今老甚,目力昏花,又不复能作矣。”同年夏五月,他寓云间玄真道院,作《芝兰室图》;七月,作《秋林烟霭图》;九月,于江上亭作《浅绛山水》。此后,他虽目力不逮,仍然作画,“往来三吴”(《无声诗史》),直至满头白发的暮年。

偶翻《杨仲弘诗集》,我发现其中有《再用韵赠子久》。由此,我们可知他“霜雪暗盈头”时依旧活动在太湖一带,“终营狡兔谋”,可见他尚有很多落脚的地方。

八十岁时,黄公望曾与无用禅师一起去富春山,领略江山钓滩之胜,暇时南楼作画。晚年因爱杭州湖山



之美,曾结庐于杭州的笕笕泉畔。据《辍耕录》(卷九)记载:“杭州赤山之阴,曰笕笕泉,黄大痴所尝结庐处。”《无声诗史》亦载:“大痴道人,隐于杭州笕笕泉。”

至正十四年(1354年),黄公望在杭州逝世,享年八十六岁。也许是中华民族千百年积淀的“落叶归根”文化心理,纵然客死“天堂”,黄公望也要归葬故里虞山。对此,民间还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。如周亮工《书影》:“李君实(日华)曰:常闻人说黄子久……一日于武林虎跑,方同数客立石上,忽四山云雾拥溢郁勃,片时竟不见子久,以为仙去。”孙承泽《庚子消夏记》也有“人传子久于武林虎跑石上飞升”的记载。方薰《山静居论画》亦云:“辞世后,以有见其吹横竹出秦关,遂以为蝉蜕不死。”这些传说当然不可信以为真。

从黄公望的一生来看,由“少有大志”到“试吏弗遂”,乃至“绝意仕途”,其实都是出于不得已。他晚年的思想也确实处于沉静安稳状态,尤其是他加入新道教之后,仅以诗画为事,其生活和思想已无太大的波动,这在他的画中都有所体现。其晚年所作长卷《富春山居图》对后世影响最大。

徘徊在黄公望墓前,我不由得想起了梁衡《迈索尔土王邦寻旧》结尾的一句至理名言:“一个人,不管自觉不自觉,只要他为世界留下一份有价值的文化遗产,便可永恒。”我想,黄公望就像虞山一样永远屹立在我们乃至后人的心目中!

#### 四

屏风迭里雁初回,艳艳湖天片月开。  
紫柏去时春色老,可中还有到人来。  
数滴瓶泉花小红,丝丝禅供翠盘中。  
秋光坐对蒲塘晚,一种香清到色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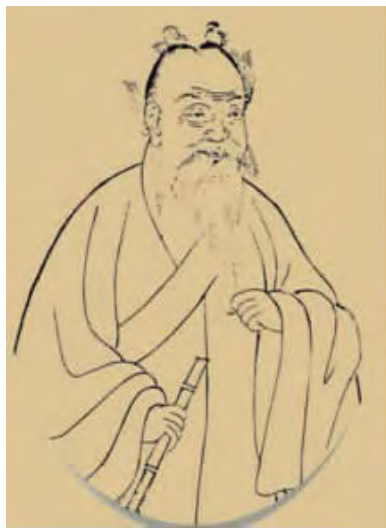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汤显祖《忽见缪仲淳》

寻找缪仲淳墓途中,我们经过了几处古迹,而且听到了几个传说。

虞山北麓半山腰处,有石屋洞。相传,姜尚曾经隐居于此。洞西有舜过泉。相传,虞舜曾饮过此水,因此得名。两边巨石嶙峋,岩石之上有明清以来文人雅士题刻十余处。山坳则为江南名寺兴福寺(即破山寺)所在。在拂水岩下有石崖高达八米,中宽二米有余,顶端有怪石凌空相迭,气垫磅礴,为虞山石景之最。相传,吴王夫差当年在此试剑,一剑劈开巨石,故名剑门。

边看风景,边听传说,我们终于走近缪仲淳墓。其墓就在北麓舜过泉旁。

对缪仲淳,《明史》只是一笔带过,近乎残酷,只有数言仅附于《李时珍传》后:“……常熟缪希雍皆精通医术,治病多奇中。而希雍常谓《本草》出于神农,朱氏譬之《五经》,其后又复增补别,譬之注疏。惜朱墨错互,乃沈研剖析,以本经为经,别录为纬,着《本草单方》一书,行于世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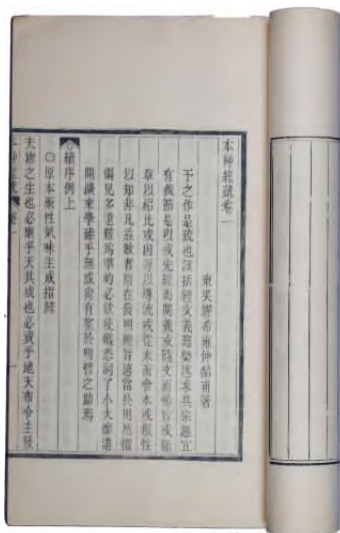
缪仲淳像

阅读这段文字,我感觉就像在咀嚼一块压缩饼干。因而,我不得不抱怨张廷玉吝惜笔墨。

缪仲淳,名希雍,号慕台。明嘉靖二十五年(1545年)出生在常熟城中新巷(今常熟市辛巷)的一个世代仕宦之家。他的父亲缪尚,字行达,是位颇有学问的举人,官至汉阳府通判,在缪仲淳七八岁时死于任上,从此家境渐衰。缪仲淳幼年生活孤苦,体弱多病,经常求医服药。十七岁那年,缪仲淳又得疟疾,久治不愈,就自己翻阅医书,寻求治法,终于在《内经》“夏伤于暑,秋必痲疟”的理论启示下,自治而愈。于是,他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自此,他一面在家设馆授徒以维持生计,一面搜辑医方,精求药道,立志做一个有补于世的医生。

缪仲淳天资敏捷,博览群书,兵农礼乐,天文地理,无所不读,特别对医学著作更是认真钻研。自家藏书读完了,他就到离家数街之隔的赵用贤家去借读。赵家珍藏着很多宋刻善本医书。缪仲淳如获至宝,终日沉湎于书山学海之中,沉研剖析,割剥理解,遇会心处,辄摘记之。积累既久,缪仲淳在医学上打下了厚实的理论基础。在此期间,他还利用附近病家请医诊病的机会,也主动去观察学习医生治病用药的本领。他看到一位老医生竟用草石蚕治疗血痢,大为惊异。因为这味药在古书中并无治病作用的记载。后来经他试用,竟获良验。从此,他逐渐认识到,古今不同,五方异处,感受之深浅,禀赋之厚薄,是千差万别的,倘若执古方以临之,似胶柱鼓瑟。于是,他在头脑中形成了古方新病不相能的思想。他认为,古代的许多应学医学名著虽为医者所必读,但必须变而通之,则法不终穷。

缪仲淳二十七岁便学有所成,开始了他漫长的



《神农本草经疏》书影

行医生涯。他不仅走遍了江苏各地,并且南入浙闽,北涉齐鲁燕赵之墟,复浮江西,游历了安徽、湘南、湖北及江西等省。他到处侨寓,故又自称寓公。无论贫富富贵贱,他都一视同仁,行医不计报酬。此外,他还打破医不叩门的习俗。在旅途中,缪仲淳还到处寻师访友,与缙流羽客、樵叟村竖,相与垂盼睐,披肝

胆,更不放过与同道切磋的机会,所至必访药物。在浙江径山,他拜过名僧紫柏为师;在湖北武昌,他晋谒过医官邓思济,传其秘方;在湖北九江,他向一位姓朱的江湖郎中讨教痘科异治之术,以故搜罗秘方甚富,如鱼腥草治肺痈,西河柳透麻疹,五味子抗衰老等民间方药,都是古方书所不载,而是由缪仲淳访求记载才传下来的。天正六年(1578年),缪仲淳旅游行医到秣陵(今南京)时结识了名医王肯堂,两人一起谈医论药,十分投机。缪仲淳发表了许多精辟的学术见解,并把秘制的资生丸方毫不保留地传给了王肯堂,令其倾倒。王肯堂曾亲自试服资生丸,证明有效之后,又献于其父作余龄葆摄之用,称誉神方。而缪仲淳对王肯堂也很推崇,称赞王氏精医,他还和王肯堂一起诊病研讨,取长补短,继绝存亡。譬如“云间康孟修寒热不食久之,势甚危,投以寒热之剂不应。缪仲淳遍检方书,与王宇泰(即王肯堂)议,投五饮丸,立解”。后来他还原原本本把这件事记录在自己的著作《先醒斋广笔记》中。这种不昧己短,不掩人长的表现,实为杏林之佳话。

四十岁后,缪仲淳才结束了长达十余年、行程几万里的壮行,终于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虞山。十余年间,他广交了贤达人士,饱览了山川秀色,获得了许多书本以外的知识,从而磨炼了意志,开拓了胸襟,增长了见识,由高人成为一名集多种技术于一身,尤其精通医学的名医。

缪仲淳为人重气节,娴经济,关心国计民生。万历初年,张居正改革朝政时,他建议在北方兴修水利,辟召南方善农者种植水稻,以改变京师粮仰南方的局面。这个建议得到工科给事中徐贞明的采纳。万历中期,即在缪仲淳五十岁以后,朝廷日趋腐败,矿监税吏,四

出勒索,民不聊生,哀鸿遍野。目睹时艰,缪仲淳忧心如焚,毅然加入了东林党,和丁元荐、钱一本、于玉立等人以节概意气相期许,讽议朝政,裁量人物,与阉党作斗争,并且举家迁到浙江长兴,与丁元荐结为邻居。他鼓励于玉立在朝廷要为民请命,保持气节。他还与钱谦益议论朝政,斥宦党为危害国家、草菅人命的小人。他深夜到常州叩访钱一本,两次为同族缪昌期传递斗争信息,故在东林党中有“义侠神医”之称。缪仲淳的这些言行当然逃不过宦党遍布各地的耳目,他们怀恨在心,伺机报复。佞臣王绍徽编了一本《东林点将录》,竟将东林党人比作水浒一百零八将。其中常熟人及与常熟有关的就占了五名,缪仲淳则被比为“神医安道全”,准备加以陷害。后来由于缪仲淳是个布衣,且以行医为生,行踪不定,加之不久阉党势败,才得幸免于难。从此,他就自称“海虞遗民”,比作劫余之人。

此后二十多年,缪仲淳为实现他有补于世的初衷,除了忙于救死扶伤之外,致力于医学教育和著述。他对前来求教的人,总是有问必答,有求必应,从古代医学理论到临床诊断技术,从秘传方药到独得心法,无不认真传授。他还特别重视医德教育,为此专门写了一篇“祝医”的论文。他培养的学生很多,见于史籍的就有常熟张应遴、马兆圣、荣之迁、徐鹏,昆山李雅稚,无锡司马大复,吴江沈令誉,杭州刘默等八人,他们在医学上都做出了一定贡献。

缪仲淳的医学著作流传至今的有十二种,其《神农本草经疏》和《先醒斋广笔记》两种曾经录入《四库》。《神农本草经疏》早已传于国外,日本亦有活字排本。在外感病方面,他继承而又发展了张仲景《伤寒论》的理论方药,是温病学说的奠基者之一。关于脾胃论证的学说,他填补了当时脾胃学科空白,启导了后世无限法门。他创造了治脾名方——资生丸。此方沿用至今,为著名中成药之一。

不过,神医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。风流才子汤显祖曾得梅毒,慕名寻访缪仲淳求医问药,并且写下《忽见缪仲淳》绝句二首。后因长期医治无效,汤显祖写下了一首《七年病答缪仲淳》诗:

不成何病瘦腾腾,月费巾箱药几楞。

会是一时无上手,古方新病不相能。

缪仲淳一生中最后数年,是在金坛度过的。天启七年(1627年)病故于寓所,享年八十二岁。缪仲淳没有子女,只留下一大堆“朱黄甲乙”的著作。